

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 的学理因素探究*

马丽蓉

内容提要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权）力说”等均对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确立、实施和调整产生了影响，他们学术思想中的政策相关性更构成布什政府对中东战略的重要学理依据。其中，亨廷顿与福山等人的学术理念对“布什主义”影响甚深；约瑟夫·奈则对布什政府修复“美国形象”、后布什政府重振国家实力等积极建言。在美国对中东战略陷入困境之际，亨廷顿等人的学术观念亦遇到现实的严峻挑战，且政府与学界都出现了调整与反思的迹象。探究这些重要的学理因素，旨在深度体认并预判美国对中东战略及其走势，反思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学界强化研究“思维的主体性”所产生的销蚀力，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关键词 美国 中东 战略 亨廷顿 福山 约瑟夫·奈 学理因素

作者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上海 200083）。

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强大的同时，也建立了美国霸权话语。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最好的一例。而美国的霸权话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说”等均对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确立、实施和调整产生了影响，他们学术思想中的政策相关性更构成布什政府对中东战略的重要学理依据，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左右着布什政府对中东的战略。

“文明冲突论”与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确立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该文几乎“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1996年，他出版了由此文扩延而成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又引起世界关注，其“前言”明确指出：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做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一般项目“中东热点问题文化精读”及上海市重点学科阿拉伯学资助项目前期成果之一。

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确提出了一个对学者有意义,尤其对“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并“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而且,就在“文明冲突论”在全球形成广泛影响之际,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马德里三一一爆炸案、“伦敦连环大爆炸”、沙姆沙伊赫七二三血案,以及巴以冲突中的无辜死难者和殒命街头的伊拉克教徒等“冲突事件”的频发,似乎都在印证亨廷顿的“冲突”说。身处冷战后“一超独霸”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美国,重新寻找对手便成为追逐霸权利益的必然选择。这,既是亨廷顿这一学术思想产生的立论背景,也是“冲突论”这一学术观点跃升为美国决策者最有用“霸权方略”的现实诉求。因此,亨廷顿的具体论述都围绕这一现实任务展开的,并从树立假想敌到罗列冲突罪状,继而到确立冲突主战场,最后到炮制霸权舆论等基本思路来进行推演的。

(一) 亨廷顿武断判定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联手将是未来世界的最大威胁

亨廷顿多次以中东地区为例印证自己的“冲突说”,在罗织“文明冲突”罪状时也多以中东问题为佐证。在他看来,尽管儒、伊文明“从根本上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①如果说,亨廷顿当年将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视为西方文明最强劲对手时并未明示其意的话,那么,他在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中则一语道破:

九一一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代,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②

可以说,西方媒体大肆炒作的“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就是对亨廷顿所谓“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的进一步渲染,布什政府针对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相关政策中也更难摆脱敌意与成见的干扰。

(二) 亨廷顿蓄意挑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竭力强调二者间的不容、排斥和冲突性,假借宗教之名为西方殖民和后殖民行径开脱罪责

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③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④

①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前引书,第234页。

④ 同上书,第299页。

显然，亨廷顿不仅武断地将伊斯兰与西方间的历史关系判定为一种结构性的“根本冲突”，还将同源异教的两大宗教文化彼兴此衰的历史演进视为穆斯林戒备与防范心理使然。

（三）亨廷顿悍然确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文明冲突”的主战场

亨廷顿无视伊斯兰这一宗教的和平本质，也无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恐怖活动与政治冲突，武断地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相联系，一味强调穆斯林的“好斗”和“冲突”，并列出了“穆斯林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①

“人口膨胀、缺少核心国家”又成为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所在。^②

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③

当然，当穆斯林“与生俱来”的冲突性与美国“救世主文化”的霸权诉求相遇，导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频发“冲突”，九一一事件更为亨廷顿的“冲突说”提供了极好的佐证，甚至在基辛格看来，“好战的穆斯林是对国际秩序最迫在眉睫和最显而易见的挑战，核扩散是对全球生存的最长期和最隐匿的威胁。”^④将“好战的穆斯林”的挑战提升为“核扩散”般的威胁，也将真正威胁国际秩序的“谋霸”野心掩于全球范围的“反恐”与“防核”之中，进而形成了“布什主义”的基本思想，其现实基础是九一一事件后白宫对其中东政策的大调整。即从“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获得能源或建立军事基地”向“更加强调促进市场经济、教育改革和公民参与——男人和妇女同等地参与——社会事务，并逐步加强民主制度和程序建设”的转变，以扭转“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断增长的社会气候”^⑤。

可见，“布什主义”烙有“文明冲突论”的鲜明印记：布什政府将报九一一事件之仇的军事行动定性为“全世界的战斗”，甚至“文明社会的战斗”，进而以“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来划分世界，希望各国的态度是认为“打击一个国家就是打击全体”，借此“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亨廷顿的这一学说就这样成为确立美国反恐战略，尤其是中东战略的理论圭臬。

“历史终结论”与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实施

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将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联手视为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最具威胁力的敌人，其潜念在于文明的西方世界与非文明的其他世界的冲突，流露出充满敌意的“我对他者”的二元世界观，那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更渗透着这种世界观。“历史终结论”源于福山1988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后撰文为《历史的终结？》，刊于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他认为，东欧剧变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的终结”。亦即，历史演进已走向完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1992年，他又将此文扩写成专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进一步阐释“历史终结论”的同时，还分析“自由、民主”发展到顶峰后的“最后之人”问题，以此说明“历史终结”后的人类状况。^⑥事实上，福山所宣扬的世界终为“民主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克林顿时期就转化为一种政策诉求，并成为其执政核心——经济、安全与民

①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前引书，第297页。

② 同上书，第290页。

③ 同上书，第419页。

④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论世界前景》，载《国际政治》，2005年第3期，第110页。

⑤ 转引自马丽蓉著：《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⑥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什上台后，他以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为政策指针（亦即以自由市场经济观念为基础），认为在一种政治背景中只有一种经济体系可以立足，这种政治背景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这种经济体系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而言，福山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行动指南，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大力推行的“民主”制度的改造，就是遵循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布什政府所竭力推行的民主改造“大中东”战略就是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具体实施：2002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会上首次对外阐述了以扩展民主来改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同年12月，前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题为“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为未来岁月构建希望”的演讲，披露了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计划；2003年2月，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大体勾勒了民主改造“大中东”的政策；同年11月，布什在美国商会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中东自由前瞻战略”；2004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大中东”概念，并向国会阐述了扩展民主的政策措施；同年6月，美国政府在锡尔岛“八国峰会”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大中东倡议”，并赢得支持；布什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将与自由的同盟者站在一起，支持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民主运动，最终将暴政从我们这个世界上扫除干净。”他建议把“全国民主捐赠基金”预算增加一倍，用于“发展中东地区的自由选举、自由市场、自由舆论、自由工会之上。”还希望伊拉克成为中东民主样板，发挥多米诺骨牌效应。但事实上，美国欲使之成为“民主样板”的伊拉克却成为恐怖分子生成的策源地，并因此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民主改造“大中东”战略动机的广泛质疑，“阿拉伯民主之春”相继结出了令美国措手不及的“民主果实”，严重影响美国对“大中东战略”的具体实施……相关的全球舆论调查显示，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反美情绪皆因伊拉克战争而高涨，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均对美国持消极看法。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福山于2006年2月19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新保守主义之后》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布什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理念；同年，福山继而推出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①，严厉地批评了布什政府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他将新保守主义兴起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为对苏联失败的“过度反应”，且无限夸大了恐怖分子与萨达姆所造成的威胁，致使伊拉克“似乎正悲剧性地陷入内战”；正是由于九一一事件的刺激，才导致白宫在2002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采取了“单边主义”路线和“先发制人”策略；民主不能单靠外部力量来实现，民主程序与民主过程均因不同文化愿望而异……最后他还提出中肯的政策建议：“一种建立在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而不是一种依赖军事威力的政策；运用软实力而不是武力的政策；承认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因此，不能从外部将‘民主’强加给它们。”^②他甚至在另一部新著中大胆质疑布什的政策：世界是否如布什所称的那么危险？是否能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对付伊拉克之类的威胁？事实上，“如果这种威胁被严重夸大，那么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争理念本身就会成为全球不稳定的头号祸因。”^③显然，作为一个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主张上的“曾经的支持者”，福山的此种反思有说服力，因而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与回应。2006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美国的外交政策今后将表现为“基于伙伴关系，而非家长做法的转型外交”，并“在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化中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机构的发展，最终实现在世界上结束暴政的目标”；2006年3月，白宫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仍将民主化作为

① See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新加坡】马丁·雅克著；王丽莉译：《新保守主义之后》，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第59页。

③ 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争取反恐胜利的手段、“先发制人”作为美国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但也表示将重视“软实力”，并优先使用外交方式和采取国际合作。因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是理想主义的，但我们的手段是现实主义的。”如此典型的断语表述更渗透出福山学说的影响烙印。

可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布什政府确立全球反恐战略提供了强势的舆论支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为美国推行“大中东”战略提供了根本的实施方略。福山深刻反思伊拉克问题，并对美国对中东的战略提出质疑与批评，则显出国际问题专家正视现实的应有态度。

“软实（权）力说”与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调整

阿根廷新闻社曾载文总结了“有十大理由促使人们颇不信任美国”：架空联合国；长期以来有预谋地干涉他国内政；总是感觉世界充满威胁；对民主的理解错误；外交政策双面性；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权；致力于军事化；造成脱离常规和不自然的全球化，导致贫困和灾难；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差距悬殊；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①可以说，在美国失信于世界的十大理由中，其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缘于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亦即，用军事侵入、政权更迭的方式培植亲美政府，以反民主的方式强力推行美式民主，以“反恐怖主义”、“大中东民主改造”，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名，谋取世界霸权，尤其是谋取中东的能源与地缘资源。因此，美国失信于世界，甚至失信于美国民众都不足为奇，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2007年9月17日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这又进一步降低了美国日趋下滑的国际声誉。可以说，美国不仅在伊拉克重建、伊朗核问题，以及巴以和谈等中东重大问题上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硬实力，同时也输掉了巨大的软力量，弥漫于美国内外的仇美、反战情绪即为明证。面对美国身陷“伊拉克恐怖泥潭”而难以自拔的现实困窘，约瑟夫·奈呼吁政府应正视国家软力量日趋衰落的严酷现实，加强修复全球领域的“美国形象”。

自从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软力量”、“软权力”及“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后，围绕它们生发出诸多不同理解，他本人也在不断充实和发展此概念的学术求索中对美国调整对中东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1990年出版的《谁与争锋》旨在反驳当时盛行的“美国衰败论”，认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个层面，即在‘软力量’上也无人与之匹敌。”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组建的广泛国际联盟即为明证。此后数年间，此概念不仅被美、英等国的政要、媒体和学界广泛应用，也遭致曲解与误用，甚至令他本人也倍感沮丧的是，“某些政策制定者忽略我们软力量的重要性，以至于毫不必要地将软力量挥霍一空，从而付出了代价。”因此，他在2002年出版的《美国力量的悖论》中，再次阐释“软力量”理论，并向布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政策建言，引起《国民利益》《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等重要刊物的关注，《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及《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也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约瑟夫·奈对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所发出的“提醒”或“告诫”。《外交政策》在题为《美国不能再当孤胆骑警了》的书评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应该成为下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约瑟夫·奈在2004年的新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又对此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伊拉克战争“给美英政府的可信度造成了得不偿失的重创”，以及“恐怖分子正是通过其软力量来赢得广泛支持和招募新成员的”现实，希望此概念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得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毕竟“运用软力量没有像运用硬力量那样单边，我们还需要好好上这一课。”^②2005年底，他继而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中国软力量的崛起》中指出，中国软

① 参见胡利奥·塔夫拉达：《颇不信任美国的十大理由》，阿根廷新闻社，2007年8月27日。

②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等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24、134页。

力量的崛起已对美国利益构成了某些威胁；2006年，约瑟夫·奈又告诫布什政府应同等认识软、硬两种力量的重要性，并思考如何形成旨在结合二者的巧妙政策^①；2007年，他又直言布什政府在后九一一时代的外交失败，皆因只重视军事实力而忽略软力量所致，并披露美国政府2003年在公共外交上对伊斯兰国家的各种投入共计1.5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美国2小时的国防开支。^②约瑟夫·奈的这番言论也赢得了广泛认同。2007年6月，美国三大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同时在国家热档电视访谈节目中出现，向政府积极建言：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美国在使用武力方面一定要谨慎，要更愿意与其他国家商谈；美国国务卿赖斯于同年访问法国时说：“我广泛使用‘实力’这个词。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同情实力和希望实力。”^③显然，赖斯等决策者对软力量重要性的进一步体认，影响其处理中东问题时的立场与对策，进而影响了布什政府“鹰派”与“鸽派”的力量消长。最近，在伊拉克重建、伊朗核问题、巴以和谈、民主改造“大中东”等问题的处理上，布什政府虽仍坚持美国主导的基本立场，但也开始寻求与国际社会“磋商”解决棘手问题的外交途径，力求挽回美国在伊拉克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余 论

在探究了冷战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学理因素后，笔者发现以下几点启示不容置疑：

（一）“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与“布什主义”互为因果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在“复仇主义”政治冲动的驱使下，布什政府相继向阿富汗与伊拉克发动了两场反恐之战，以美国对中东战略为核心思想的“布什主义”也逐步面目清晰：（1）打击国际恐怖主义；（2）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3）用美式民主改造“大中东”，根除滋生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4）用武力手段更迭庇护恐怖主义组织的“邪恶轴心国”，最终消除中东地区的“暴政”。显然，除以色列内阁部长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中的“暴政”理念外，亨廷顿与福山的理论成为“布什主义”最重要的学理依据，前者确立了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目标及其主战场，后者规定了防止核武器、消除危及美国本土安全的手段与方式，亨廷顿与福山等人的学术理念对“布什主义”影响甚深即可略见一斑。

（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影响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实施进程及其走向

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软实力思想以来，约瑟夫·奈的这一学术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迥异的影响力，尤其是后发于90年代的“文明冲突论”在产生影响，软渗透的思想淹没在硬对抗的强势话语的汪洋之中。但美国两届政府分别陷入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泥潭而使“美国形象”受损，又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为修复“美国形象”而调整相关的对外战略。约瑟夫·奈自2002年以来不断提出关于修复“美国形象”的政策建言，不仅呼吁“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愈发重要”，还洞察了“中国软实力崛起”，强调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对22国进行民意调查时发现，近半数受调查者认同中国的正面影响力，对美国则仅为38%，说明中国软力量崛起与美国互为消长，美国对此应予以警觉。显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已在美国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认同，并影响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实施进程及其未来走向。

（三）亨廷顿、福山、约瑟夫·奈的学术思想调整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调整相互促进、彼此影响
亨廷顿曾在九一一事件后接受专访时表示：此事件“不是文明冲突”。2005年他继而推出新著

① 参见《约瑟夫·奈：拉氏之后，重新关注软实力恰逢其时》，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6-11/20/content_7382152.htm

② 陈之昱：《约瑟夫·奈：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愈发重要》，<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70101/16533212587.shtml>

③ 詹得雄：《且说美国的“软实力”》，<http://gb.cri.cn/18904/2007/10/08/2165@1793331.htm>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诸多挑战,阐述了美国在本世纪初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应发挥的作用,研究视角由表及里地进行了调整;福山则于2006年公开抨击“布什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之作了“一次清算”,借反思伊拉克问题来重申“历史终结论”;约瑟夫·奈先在新著《美国力量的悖论》中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积极献策,后从中美两国软力量彼此消长这一事实中意识到“软力量的运用更不能实行单边主义,这是美国尚未认识到的事实。为了有效地与世界沟通,美国首先需要学会倾听。”^①这些学者不同程度的学术思想调整均影响了美国对中东战略的调整,而美国对中东战略陷入困境的严酷现实又不同程度地反作用于他们的学理性判断,“双重调整”相互促进、彼此影响。最近,福山又罗列出布什政府行使霸权政策所犯的四大错误:美国不应将针对非国家恐怖组织的“先发制人”策略应用于伊拉克等国家行为体;对霸权招致的全球性反美情绪估计不足;高估了传统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军事占领计划准备不足,在行动受挫时也未能见迅速调节。^②可以预见,福山的此番批评,将对布什政府甚至将来的新政府产生积极作用。

(四) 美国学术话语及其政策话语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从某种程度论,西方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话语中占有极显著的地位,而美国学术精英话语又一直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导向起到制约作用,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多属政府智囊团,甚至决策执行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大多集学者、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官等诸多身份于一身,其学术思想中的政策相关性便成为执政策略的重要学理依据。因此,以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霸权学术话语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东战略,也影响着全球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正常发展,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对非西方国家学者强化研究“思维的主体性”产生了负面作用,进而影响到为构建“和谐中东”提供科学的智力支撑。目前,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问题,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中的“和谐、和平、共赢”等理念使“北京共识”备受关注,但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应当勇于担起此项重任,力争有更大的作为。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自己击败的霸权》载《土耳其周刊》,2007年10月31日,第1期。

② 同上。

· 资料库 ·

卡塔尔人均收入居全球第五位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近期发表的报告,2006年卡塔尔人均国民收入为66063美元,在全球221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五位,在海湾及中东地区位列榜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居世界人均收入前四位的是:列支敦士登(82826美元)、百慕大群岛(78538美元)、挪威(71822美元)和卢森堡

(71366美元)。在其他海湾国家中,阿联酋人均收入为41082美元,科威特40114美元、巴林20609美元,沙特阿拉伯15131美元,阿曼11275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07年12月29日)

(詹世明 摘编)

On the Func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1 of 2)

Li Yueqin

pp. 5– 11

The religion has other social functions besides its original meaning. Islamic culture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Islamic politics, which has different contents and belongs to different conceptions. The content of Islamic culture is wider than the content of Islamic politics, and Islamic politics is only one part of Islamic culture. The presented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function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 based on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ligion,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consultation, the relations within religion law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function of Islam originated in its identity, and emerged from the womb of the history of Islam, wit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stage of unity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stage of the unity of Khalifah power and monarchical power and the stage of divis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A Theoretical Probe into the U. S ' s Strateg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after the Cold War

Ma Lirong

pp. 17– 23

Some popular theories lik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Huntington Sannel), “The End of History” (Francis Fukuyama)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Power” (Joseph S. Nye), have all imposed on U. S. policy decision, implement and adjust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some of their theories a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to make U. S ' s Middle East Strategy. Especially, the academic theories of Huntington Sannel and Francis Fukuyama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Bush Doctrine”, and Joseph S. Nye once suggested Bush Administration to restore “American Image” and national power in

the world. Now, U. S. is falling into difficult 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ome theories like those advocated by Huntington Sannel are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and voices from both government and academy were heard to readjust th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se theor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or judge better the trends of U. S ' s Middle East policy. It is also useful to rethink the corrosive influence of American ' s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cademic fields on “The Subject of thinking”, so that to support the scientific study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world”.

Assessment on Afghanistan and U. S ' s “Pan Central Asia Planning”

Li Jie & Yang Shu

pp. 24– 30

The goal of U. S ' s “Pan Central Asia Planning” is to form a new regional combination ranking from central Asia to south Asia which is dominated by U. S. including Afghanistan, India, Pakistan and Turkey, through cooperation in such areas as security, democracy, economy, transposition and energy in order to weaken influences

coming from China and Russia and gain the regional superpower. It will face with great difficulty in carrying out such a strategy owing to the limited capability of Afghanistan, and the limit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 India, Pakistan and Turkey. The implement of the combination may also be weakened by the attitudes from China and Russia.